

王仙芝和黃巢

趙儷生編寫
山東人民出版社

王 仙 芝 和 黃 巢

趙 儷 生 編 寫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濟 南

王仙芝和黃巢

趙儷生編寫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東分店發行

*

書號：1650

開本787×1092 1/32·印張1 1/16·字數：18千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0

統一書號：11099·69

定 價：（5）0.09元

王 仙 芝 和 黃 巢

趙 儷 生 編 寫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濟 南

唐朝是自公元七世紀初到十世紀初統治了我國二百九十年的一個封建皇朝。它的具體統治年限是六一八到九〇七。最初，它是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烽火中，由軍事貴族唐國公李淵和他的兒子李世民（即著名的唐太宗）起兵，壓平了各地的農民起義力量和地方割據力量，而建立成功的。由於接受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教訓，唐太宗在他的統治期間曾經對人民進行了一些妥協和讓步，執行了一系列恢復社會生產、減輕人民租稅負擔的措施。這些措施大大地安定了社會的秩序，增進了社會的繁榮和國力的強盛。所以，「貞觀之治」，是曾經被中外的史書上都稱贊過的。但很快，跟着唐朝封建社會矛盾的積累，相對安定過的社會秩序，又開始紊亂了；繁榮的社會景象，越來越多地露出衰敗的跡象來了；一度強盛的國力，也被國外異族的入侵、和國內割據軍閥的混戰所削弱了。但是，我們試問：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試探着去接觸一下當時封建社會在其自身的段落性轉化過程中的一些矛盾特點。^{*}關於這，需要比較細密地來說一說。原來，自從公元四、五世紀的北魏以來，一直到唐朝的中葉，我國社會的總的面貌是比較最典型的封建社會。它的特點是：社會生產以地方分散性的農業為主；商業和手工業是不發達的，並且對於農業說，帶有附屬的性質——也就是說，商業手工業對於農業的分离，還不明顯；並且由於

商業的連絡網還很不普遍、很不健強，因而我國部族（民族前身）共同體的內部凝結力，比較起宋朝和宋朝以後來，是弱一些的。當時，唐初大帝國之所以那麼強盛，這個緣故，不是由於我國部族共同體內部凝結力的強大，而是由於以軍事貴族為首的專制皇權的強大。皇權為什麼會這麼強大呢？很簡單，由於在它手里控制着「均田」和「府兵」，控制着「租、庸、調」。什麼是「均田」？簡單地說，「均田」是指將控制在專制皇權手中的大量土地，由政府按照年齡等差別分配一定數量的土地給人民耕種，從而榨取租賦。什麼是「府兵」？簡單地說，「府兵」是指按照分配土地的同綫索，政府抽調壯丁，去服兵役。什麼是「租、庸、調」？簡單地說，「租、庸、調」是指被分配了一定數量土地的人民必須向專制政府繳納實物地租、勞役地租，以及以某種用貨幣形式（布、帛）表達的勞役地租，等等。總括起來看，唐中叶以前的專制政府手里握有大量的土地，充足的兵源，握有從勞動人民那里榨取來的大量糧食和布、帛、綾、絹、綿、麻等等的物資：——那麼，這樣的國家政權在當時怎麼會不表現得很強盛呢？

* 這一段的文字可能有些不够通俗，但經過作者反復考慮，認為這一段的內容是必不可少的，和本書尾部結論性的內容是密切相關的，因此即便稍稍艱澀一點，也請讀者耐心地讀下去。

可是，既然說強盛，為什麼又說它慢慢地衰落下來了呢？原來，社會生產力是沒有一時一刻不向前發展的，而生產力一發展，那些地方分散性的農業基點（封建領主莊園）必然不能長期保持它們的那種地方錮閉性；而手工業和商業的逐漸發展，對於地方分散性的農業，自必起着一種分解作用。慢慢地，跟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社會上流通的貨幣增多了，這就使得某些富裕者不僅僅只能按照舊的方式依靠貴族血統去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也能够按照新興的方式拿自己手底下越積累越多的貨幣去購買土地，招徠佃戶，進行佃租的剝削了。拿錢買地，比靠身份占地，對於剝削者來說，是擴大了「自由」的輻度；替私人種田納租，比替國家種田納賦，對於被剝削者來說，也是擴大了「自由」的輻度（自然，這只是指認佃的流動性較大，而剝削額實際上則是較前加重了）。這就是我國封建社會在公元八世紀前後所曾經遭歷的一次大轉變。這次轉變，雖然只是封建社會範圍以內的段落性的衍變，但就封建社會自身說，却也是重大的轉進。在這種情況下，「均田」慢慢地瓦解了，「府兵」也跟着瓦解下來，「租、庸、調」的系統也跟着越來越複雜化和紊亂（唐中葉有個楊炎倡議實行「兩稅法」，就是要克服這種紊亂），而這些現象總起來，就成為唐室專制皇權逐漸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可是，當時社會的矛盾還不止表現在這一點上。當時，「均田」開始瓦解了，假如

当时社会的許多經濟制度和軍事、行政制度也跟着很快地適應過來的話，那麼，社會矛盾的積累還不至于多么嚴重。但封建的剝削者和統治者，受了他們階級性的局限，是不可能進行多么及时的適应的。中央皇室越來越窮，但它还是尽一切力量進行搜刮。地方割据的勢力，在商業聯絡網一天天普遍的情況下，不僅不是自己收縮起來，而是更加頑固地支撐下去，形成爲唐朝歷史上著名的「藩鎮」力量。它們互相攻伐，對抗中央，殘暴地壓榨人民，成爲当时阻碍社會向前發展的重要勢力。中央和地方，是互相對抗的；但对人民的統治和壓榨來說，它們又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生活中的苦痛增加了，他們從國家方面可以領到的土地，越來越少了；但他們按照戶口對國家和地方藩鎮方面所應該貢獻的物資和人力，却并不減少，而是增多了。于是，這便造成了人民逃匿、流亡，和土地荒蕪、農業生產收穫減少的現象。面對着這樣的情況，当时中央和地方的統治者毫無妥協讓步的表示，相反，他們更從土地剝削以外去另打主意，另出花樣。那便是：廣收鹽稅、茶稅、以及竹木等稅，來彌補他們各自荒淫奢靡和養兵打仗的種種巨大開支。這樣，不僅是廣大的農民脫離土地而流亡了，連剛剛新興起來的商販和手工業者（他們的總稱叫「小所有者」），也遭到了壓抑和打擊。所以，在唐末農民大起義的隊伍中，便形成爲以流亡農民爲主要羣衆、以私鹽販賣者的集團和人物來擔任領

導的現象，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王仙芝和黃巢，就都是私鹽販子出身。王仙芝，濮州人，販賣私鹽為業，他的伙伴很多，像尙君長、尙讓、柴存、畢師鐸、曹師雄、劉漢宏等，這些人後來有的成為起義軍重要的首領，有的墮落為半藩鎮、半盜匪式的軍閥。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王仙芝當初起事的這個「販鹽為盜」的集團，是個很有力量的社會集團，所以史書上說王仙芝是濮州的「名賊」。黃巢，曹州冤句人（冤句，是當時的一個縣治，在今荷澤縣西南四十里），他出身於一個世世代代販鹽的富商家族，由合法販鹽到不合法販鹽，從武裝保護私販，到起兵對抗政府，便是黃巢家族所經歷的一個過程。黃巢兄弟八人，哥哥黃存，弟弟黃鄴、黃揆、黃欽、黃乘、黃萬通、黃思厚，都參加了起義，其中有幾個也是很重要的軍事首領。黃巢不僅是富豪出身，並且有相當的文化修養，曾到京城會試「進士」，沒有中選，從這中間又可以看出，在他領導起義的動機之中，很可能有一般知識分子對貴族知識分子壟斷朝政的一種不滿。有的歷史材料甚至說，連王仙芝也是沒有考中的「進士」。大家要問：為什麼單單是這些有相當文化、而又大幫販鹽的人來帶頭搞反抗運動呢？其實，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統治者對人民的賦稅搾取，來源減少了，系統上也發生了許多案亂，為了彌補統治者的開支不足，他們就拚命提高鹽價，

加重鹽稅，從鹽上來剝削人民。人民不能不吃鹽，但又買不起鹽吃，無法之余，只好私制和私下里買賣。這樣，統治者又制定了嚴酷的鹽法，用死刑和各种殘酷的懲罰來對待鹽的私制者和私賣者。私制者和私賣者為了保證他們走私的順暢無阻，于是便由較高階層的分分子為首組織起武裝來。而這種武裝，在当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般流民們醞釀起义過程中的先鋒部隊。

除去這個武裝販賣私鹽的先鋒力量之外，唐末農民大起义也還另外接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譬如說，山東曹濮二州之地距離徐州是不遠的，在王仙芝、黃巢發動起义之前六年，在徐州和徐州以南、洪澤湖以西的地區里，就爆發過在龐勛領導下的起义。這是一場兵卒們的起义。由于唐朝和南詔國間的戰事，他們被皇家調到桂林去駐屯防守，過了規定限期還不放他們回家，他們就在桂林發動暴動，自動武裝返鄉，進行起义。由于起义軍方面存在着缺點和各种不利的條件，這場起义僅僅支持了一年半，就被統治者壓平了。首領龐勛，在戰役中英勇地戰死了。起义的戰士們潛伏下來，一等王仙芝、黃巢發動了新的起义，他們便即刻前去參加了。這些戰士是老有經驗的，有抗击各种官兵的經驗，有往返湖廣泛江操船的各种經驗。這些經驗，對於以後王仙芝、黃巢离开山東故鄉、踏上更廣大的活動領域來說，是不能沒有幫助和啓發的。

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冬十二月，王仙芝在長垣縣界首先舉義，自称「天补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这个称号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平均」二字，顯然帶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內；「海內諸豪」四字，又顯然表現出起义軍对一切反唐势力所抱的不排斥的态度。起事之初，据说王仙芝有万余人，黃巢初來参加时所帶領才数千人，規模不是頂大的。但不久，他們發布了反唐的傳單和告示，参加的人就驟然多起來，不久便發展到將近十萬。起初，他們的目的只是想攻下沂、蒙山地作为他們臨時性的軍事根据地，并从而進兵拿下青州那样的手工業城市來。但当时駐守在青州的平盧節度使宋威是个老有經驗的軍官，初起的义軍打他不过，吃了几次敗仗。于是，起义軍便放棄向东的攻打，轉向西南方的中原地区深入。他們这样地做出决定，不会是沒有原故的。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目的似乎在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他們想避开頑强的藩鎮軍事势力，找尋統治者間的弱点去突破；第二，他們想尽可能拿下东都（洛陽），那样可以大大提高起义軍的威信；第三，当时距离安（祿山）、史（思明）之乱虽已一百一二十年，但那場战争对社会生產的破坏力量是巨大的，山东、河北許多城市都遭到嚴重的損伤，一时不容易恢复起來；而黄河以南的中原豫、鄂一帶，則受傷較小，許多城市中的手工業和商業是比較發达的，貨幣聚集也比較丰富，假如起义軍能攻打下这些城市

來，他們自必剝奪到不少的物資。在這樣一些可能的目的引導之下，起義軍便接連攻打了以下的這些城市：汝州（河南臨汝）、鄧州（河南鄧縣）、郢州（湖北鍾祥）、復州（湖北天門）、蘄州（湖北蘄春），等。在這些城市里，綾絹織造業、造紙業、盜器製造業，以及初步的制茶業等，都有相當的發展。

在蘄州，起義軍發生了內部紛爭。更具体些說，是在兩個主要首領王仙芝和黃巢之間，發生了分裂。事情是這樣的：當他們攻克汝州時，他們俘虜了唐朝的汝州刺史王鐸。王鐸是朝中宰相王鐸的弟兄。當他隨着起義軍到了蘄州的時候，他就寫信給唐朝中央官吏同意了這個意的刺史裴渥，謀求起義軍和官軍雙方的妥協。以王鐸為首的唐朝中央官吏同意了這個意見，就派人來授給王仙芝以「左神策押牙」的官職。「神策」是皇帝近衛軍的名稱，「押牙」也叫「押衙」，是一個僅次於「將軍」銜級的四品武官職位。這個職位不算很低，但近在皇帝腳下，各種約束自然很多。唐朝之所以單單拿這樣一個官位來誘惑王仙芝，自然是想使他有虛名而無實權，易于約束，這顯然是一種欺騙和軟化的手段。但王仙芝竟接受了這個條件，正式開筵席來慶祝了。却不料黃巢不同意這樣做，二人當場衝突起來，黃巢還打了王仙芝的耳光，唐朝這場眼看就要成功的欺騙和軟化，又立刻被阻撓和粉碎了。黃巢為什麼要這麼猛烈地來干涉這件事呢？統治者的記載說，是由于唐朝不會加給黃巢官

位的原故。这自然很可能是統治者的捏造；但由以后黃巢自己也曾表示可以受官的事迹來看，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說絕對沒有。总之，由于旧时代農民階級的种种局限性的限制，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農民階級自己不可能創立新的生產关系，所以農民革命的結果就总是失敗，有的失敗到底，有的轉化為新的封建統治者。在这种情况下，農民起义的首領自然也很容易像斯大林所說，是「皇权主义者」。他們反对坏皇帝，拥护「好皇帝」，随时都有使自己逐漸成為「皇帝」的企圖。因此，農民起义的首領企圖接受統治者的官爵，并不是多末稀罕的、奇怪的事情，只是農民革命总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現。这跟無產階級革命运动中變節分子的嚴重危害性，是不能等同起來對待的。

王仙芝和黃巢从此便分裂了。这时已是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的十二月，距离初起义整整兩年。分裂以后，黃巢率領部众返回山东鄆州（鄆城）一帶，進行軍事活动；王仙芝、尙君長、尙讓等，依旧留在大別山地区。又隔了一年零两个月之后，到乾符五年（公元八七八）的正月，王仙芝在黃梅縣的一場战役里壯烈牺牲了。尙君長也被官軍誘殺。他們的主要部众在尙讓的領導下駐屯在嶧野山（今河南遂平縣境）一帶，不久以后又跟黃巢部众重新合作，編成為一支統一的起义軍隊，以黃巢为首領（称「冲天大將軍」），以尙讓为第二位的首領，計劃着如何向南方進行長征的事情了。起义到此，就算是揭过了

它自身的第一个階段。

*

*

*

現在，我們開始來敘述，黃巢大軍怎樣向遼闊的南中國進行遠征的許多事迹了。但應該事先交代一句，這中間有幾個重要問題，按照當前保留下來的歷史材料看，是還不够充分說明的地步。譬如第一個問題，黃巢大軍為什麼要向南方遠征？他們發動南征的目的是什麼？這一點，就很不容易解答。我們現在只能就流寇主義來說明問題。什麼是流寇主義？毛主席曾說，流寇主義是游民階層的思想在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它表現為不肯艱苦地去建立根據地和政權，只是一味招兵買馬、招降納叛，只是一心想到大城市中去大吃大喝。在黃巢領導下的農民軍，他們的表現大体上正是如此。他們本是由于均田瓦解、春夏二稅負擔繁重、大家生活不下去而起來反抗的；但既經起義以後，譬如自從打開像汝州、郢州這樣的城市之後，他們首先感覺到手工業商業城市倒是挺闊的，挺有錢的，打進城去把那些官吏富豪們的財富剝奪過來，對於起義軍的發展有好处，對於個人說也可以沾些油水。這樣，他們便把首先打垮唐朝專制政府、奪取政權的事情放在腦後，或是放在第二位去了。這就是流寇主義在起作用。像這樣發展下去，大別山一帶城市剝奪得差不多了，自然而然地他們就會想到過江，因為在今蘇、浙、皖、贛四省交

界地区当时是全国各行手工業生產頂發達的地方；此外，像泉州、廣州这样的对外贸易城市，其中國聚着的資財和珍貴物品，自然更多。在这样一些誘惑下，他們便自然而然地安排向南方去的远征了。*

另一个不好說明的問題，是黃巢大軍当初沿着怎样的道路南征？从哪个地方渡江？怎样到达嶺南的？关于这些，歷史材料里記得都不够具体，而且有不少混乱。一般的記載，都說大軍是在淮南（譬如說，蕪湖至浦口一帶）渡江的，渡江以后在今苏、浙、皖、贛地区停留了一陣，積蓄了一些人力物力，后来由于受到軍閥高駢部隊的攻击，才自浙东开辟山路七百里，到达了福建，然后再向南去，到了廣州的。但后代的歷史家有不少人怀疑大軍是不是的确在淮南渡江，有更多的人怀疑过当时大軍是不是的确自浙东开山路七百里到达福建。关于这些問題，由于具体材料的缺乏，我們現在無法做出明确不移的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提出來的，浩浩蕩蕩几十万人（近一百万）的隊伍，很难是直綫的行軍。当时完全可能不只自一处渡江，更不只自一路到达廣州，可能有繞道福州的，

* 这个說法只是个人的一些推測，这种推測的可能性也不能說很小，只是目前能够具体証明这一点的歷史材料很缺乏就是了。

也可能有經武夷山脉的山脊跨過去的；此外，半路上有掉隊遺留下來的，也有在所經過地方新參加進去的。這些情況，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到。至於時間，他們是在乾符五年（八七八）的三月底渡江，第二年（乾符六年，八七九）的正月到達廣州城下：總計起來，這段行軍足足費了十個月的功夫。

「黃巢大軍到達廣州城下，但並沒有即刻攻進城去。起義軍在廣州城外及其附近的州縣一帶，駐扎了八個月，作為跟城內唐朝官吏商量妥協條件的時間。根據統治者的記載說，黃巢企圖通過廣州刺史向唐朝中央政府討要官職。據說，第一次討要的官職是設在他故鄉鄆州一帶的天平節度使，第二次是要求廣州節度使，唐朝都沒有同意。唐朝答應給他的官位是「率府率」。「率府率」是太子宮中近衛軍的負責武官，也像「神策軍押牙」一樣，是第四品級的官職。黃巢得到這種答复，非常生氣，就下令攻下了廣州。攻下時是秋天的九月。在廣州城內，起義軍停留不到兩個月，自然剝奪了不少官僚富商們由剝削而來的財產，其中據說也包括了許多「蕃商」（外國商人）的財產。至於像當時阿剌伯商人所記，說黃巢在廣州曾經屠殺了十二萬到二十萬蕃商，那自然是誇張的。

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去理解這些事情呢？我認為，首先應該看出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再謀求妥協，是一種欺騙的行為。他們看到起義大軍是無法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來打垮

的。他們雖然也曾經派出宰相王鐸担任什么「招討都統」，帶兵駐到潭州（今長沙），但当时唐朝的兵力是脆弱的，兵和官間有矛盾，中央軍隊和地方軍隊間有矛盾，地方軍隊和地方軍隊間也有矛盾，他們是互不配合的，甚至是互相掣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才确定了「打」不如「招」來得上算的政策。其次，我們應該通过这件事，看到旧时代農民起义的局限性。像上文談到王仙芝时候所說的一样，旧时代的農民革命还不懂得首先應該徹底打垮旧的統治政权，还不可能組織新的生產关系，他們只希望有一片相对独立的占領区，在那里他們可以把生產恢复起來，把当初被迫脫离生產的農民們安插下去，大家可以过生活；而起义的首領們則可以逐漸把这个相对独立的占領区擴大开去，在將來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皇帝。他們的願望，不过如此。那么，他們向唐朝去討要天平節度使或廣州節度使，就并不是什么絕對不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黃巢起义大軍在廣州城內并没有停駐多久，便因为战士們多是山东鄆州一帶的人，不服廣州水土而決定要北返了。粗率地就決定南征，粗率地又決定北返，这正反映出这次大起义政治目标的不明确，以及流氓主义气味的相当濃厚。但在北返的路途中，起义大軍似乎有了某些轉變。他們又恢复了初起义时候所曾經進行过的一些反唐的政治宣傳，夺取政权的意圖又加重起來了。在北返的路途当中，軍風紀也好了一些，保證了沿途所